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举措及影响^{*}

吴诗尧

摘 要：当国际冲突影响本国关键利益时，作为冲突第三方的国家即使缺乏用于调停的资源 and 影响力且调停策略选择有限，也可能介入国际冲突并成为小国调停者。介入冲突后，小国调停者围绕实现本国利益这一根本目标，除提供调停外，还将依托其调停国身份，采取一系列务实的外交举措。小国调停者的介入在对消弭国际冲突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将对调停国本身产生复杂影响。俄乌冲突期间，由于以色列判断本国的国家安全、立国合法性、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等国家利益受到冲突的实际或潜在影响，于是选择介入其中。一方面，以色列的调停增进了冲突双方的信息传递与沟通。其在调停过程中面向冲突双方的一系列务实外交举措，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所指涉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以色列的介入致使以俄、以乌、以美双边关系均面临不确定性，背后折射出以色列政局与社会的碎片化态势。

关键词：国际冲突；俄乌冲突；国际调停；小国调停者；以色列

作者简介：吴诗尧，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100029）。

文章编号：1673-5161(2022)05-0095-2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QD20)的资助。本文曾在第三届“全国中东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进行宣读，得到与会专家的精心指导。《阿拉伯世界研究》匿名评审专家与编辑部老师对文章修订给予了悉心指导，笔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联合国宪章》指出,陷于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应该寻求通过调停等途径,推动争端的和平解决。^① 据统计,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历次国际冲突中,国际调停发生的概率超过 30%,调停者的存在使得冲突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提高了 6 倍。^② 不论是在规范还是实践中,国际调停无疑已经成为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方式。此轮俄乌冲突期间,以色列作为最早宣布介入调停的国家之一,基于自身利益诉求,面向冲突双方采取了包括调停在内的一系列外交举措。这些举措对于促进俄乌双方坐上谈判桌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使以色列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但同时也对以色列的对外关系与政局走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调停是国际社会所推崇的冲突解决方式之一,深受国际关系研究者与政策界的关注。联合国《有效调解指导意见》指出,“调解(调停)是一个进程,由第三方协助两个或更多当事方,经其同意,帮助其制订相互均可接受的协议,以防止、管理和解决冲突”^③。马尔科姆·肖(Malcom Shaw)在其编写的国际法经典教材中,将“国际调停”界定为“第三方鼓励冲突各方达成和解的行为”,主要包括“对冲突各方施以影响,从而使其进行谈判”,以及“在谈判过程中的积极参与”。^④ 在《谈判和冲突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威廉·札特曼(William Zartman)则将“调停”界定为“第三方帮助冲突各方找到他们无法自行找到的解决办法的谈判模式”^⑤。可见,国际调停就是通过调停者(第三方)的政治介入来缓和乃至平息国际冲突的冲突解决方式,冲突能否平息,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缓和,与调停者息息相关。依照此逻辑,主要大国因其突出的国际影响力而似乎更具调停能力,也就更有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调停者。事实也的确如此。数据显示,20 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在由国家担任调停者的国际冲突中,由美国、苏联(俄罗斯)、英

^① 《联合国宪章》,联合国,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26 日。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Project”, *ICB Project, Duke University*, <https://sites.duke.edu/icbdata/>,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26 日;Allard Duursma, “A Current Litera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tion*, Vol. 25, No. 1, 2014, pp. 81-88.

^③ 《联合国有效调解指导意见》,联合国,2012 年 6 月 25 日, https://peacemaker.un.org/sites/peacemaker.un.org/files/GuidanceEffectiveMediation_UNDPA2012%28chinese%29.pdf,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26 日。

^④ Malcom Shaw,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770.

^⑤ I. William Zartman,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155.

国、法国等国介入调停的冲突占比过半,远超其他国家。^①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的国家,并非国际社会主流的调停者。

但在此轮俄乌冲突中,国际影响力与调停能力相对有限的以色列,在冲突爆发初期便高调介入其中,成为调停国。为此,时任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甚至非常罕见地打破了犹太教传统,于犹太安息日期间紧急飞赴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在提供调停的同时,以色列还分别面向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了多样且动态的外交举措。例如,对俄罗斯,以色列迟迟不肯加入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行列,但又投票支持暂停俄罗斯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对乌克兰,以色列不吝屡屡在外交场合大声疾呼对于乌克兰民众的同情和担忧,却也明确拒绝乌克兰政府武器援助的请求。这些内容丰富的举措特点鲜明,尤其引人关注。

那么,以色列以调停国身份介入俄乌冲突后,其所采取的种种外交举措之间是否存在何种关系? 这些举措对于俄乌冲突以及以色列本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国际调停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受到学界持续关注,其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关注调停进程与所涉因素两种。前者从整体着眼,关注国际调停的整个过程,将国际调停划分为发生(背景)、进行、结果以及协议保障等阶段,逐一探究每个阶段的实现条件、各方行为、具体内涵以及特点。后者聚焦细节,剖析国际调停所涉及的诸多因素,如冲突方的真实意图、实力差异、与调停者关系,调停者的动机、偏向、调停能力、调停举措,冲突的性质、内容、烈度,相关的地区格局、情势动向、热点议题,等等。不论学界采取哪种视角,作为国际调停必要角色的调停者,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一) 调停国的调停动机

从国际调停的进程来看,国际调停一旦发生,意味着冲突各方和调停者对于调停的同意和接受。^② 调停者的调停动机(motivations)也因此成为学界探讨的基本问题。大体上,国际冲突的调停者主要包括国家、全球及区域性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它们可能出于人道主义、自身利益、冲突方请求、国际规范、联盟义务等方面的考虑而提供调停。^③ 就国家调停者而言,维护或增进国家利益,

^① Michael Grieg and Paul Diehl,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p. 64.

^② Jonathan Wilkenfeld, Kathleen Young, David Quinn and Victor Asal, *Mediat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5.

^③ Michael Grieg and Paul Diehl,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p. 78-93.

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调停动机。^① 原因在于,调停是凸显政治色彩的外交实践,意味着调停国消耗本国的资源来推动实现某些调停目标,从而获得某些收益。^② 这些收益包括减少冲突对本国的直接消极影响、降低冲突的负外部性、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等,无不与调停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③ 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调停者的调停动机至少包括:消减国际冲突对于本国利益的不利影响;回应冲突方的调停请求;维护或者发展与冲突方的关系;维护所在联盟(冲突爆发于盟友之间)的完整;扩大自身影响。^④ 调停国的具体调停动机各不相同,但就同类型的调停国而言,其动机也呈现出一定共性。其中,小国(small-sized power)之所以提供国际调停,更多是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必要选择。^⑤ 其调停动机主要包括防止冲突蔓延至本国境内、弱化冲突对本国不利影响、避免冲突吸引更强大的外部行动者、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与形象等。^⑥

(二) 调停国的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在调停进行阶段,调停者开始“各显神通”,尝试以多样的调停举措来促进冲突降温。丰富的国际调停案例表明,调停者的调停举措多样且多变,即便是同一个调停者,面对不同类型的国际冲突所采取的调停举措很可能截然不同。正如迈克尔·阿兰·萨克斯(Michael Alan Sacks)等人就指出,“虽然第三方介入已经成为解决争端的流行选择,但我们对于第三方将要和应该做什么,依旧知之甚少”^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对这些复杂的调停举措进行抽象分类分析。

一方面,调停举措可以被划分归类。根据调停生效机制的差异,凯尔·比尔兹利(Kyle Beardsley)和乔纳森·威尔肯菲尔德(Jonathan Wilkenfeld)等人把调停分为了助推型(facilitation)、构建型(formulation)、操纵型(manipulation)三类,

① Michael Grieg and Paul Diehl,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 62.

② Jacob Bercovitc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74.

③ Kyle Beardsley, *The Mediation Dilemm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6-59.

④ Jacob Bercovitc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 74; Michael Grieg and Paul Diehl,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p. 82-90; 陈冲:《国际调停中的理论与方法争鸣——评〈调停国际危机〉、〈国际冲突调停〉与〈国际调停互动〉》,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133-157页。

⑤ I. William Zartman,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58-189.

⑥ I. William Zartman and Saadia Touval,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Chester Crocker, Fen Hampson and Pamela Aall, eds., *Managing Global Chaos: Sources of and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6, p. 448.

⑦ Michael Alan Sacks, “Broadening the Evaluation of Dispute Resolution: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s over Time,” *Negotiation Journal*, 1999, Vol. 15, pp. 339-345.

其分别对应不同的调停举措。其中,助推型调停的举措包括安排冲突方互动沟通、确定潜在议题和利益、提供缺失信息、在冲突方之间交换信息、提供积极评价等;构建型调停的举措有突出冲突方之间的共同利益、帮助冲突各方保全颜面、提供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帮助设计和谈结果框架等;操纵型调停的举措则包括促使冲突方进行谈判、改变冲突方预期、筛选所提供信息、奖励冲突方作出妥协并对妥协负责、增加激励与施加惩罚等。^①类似地,雅各布·贝尔科维奇(Jacob Bercovitch)和斯科特·加特纳(Scott Gartner)认为,根据其行为约束力度的差异,可以把调停分为从促进型(fostering style)到强制型(forceful style)的多种类型,前者以交换信息为主要措施,后者则涵括了许诺冲突方以政治和经济支援等举措。^②除信息传递、促进沟通、改变预期、推动达成协议等几类主要举措之外,调停者的中立(neutrality / impartiality)抑或偏向(bias)立场,也被部分研究者视为一种具体的调停举措,且同调停效果密切相关。^③

另一方面,调停者具体采取哪些调停举措,往往同其调停能力息息相关。迈克尔·格雷格(Michael Grieg)等人认为,大国所具备的资源和影响力(leverage)优势,使其调停举措拥有更多选择。相比之下,小国则由于资源和影响相对不足,更多采取传递信息、促进沟通等调停举措。^④兰达·斯利姆(Randa Slim)发现,新西兰、阿尔及利亚、瑞士、奥地利等小国(small states)在进行国际调停时,大多以沟通和交流作为主要途径,发挥显著作用。^⑤陈一一也指出,经典研究普遍认为,大国因其突出影响力而能够运用各种调停举措,而小国则不然,在举措选用上显然受到制约。^⑥比尔兹利进一步指出,强大的第三方(调停者)更有可能采

^① Kyle Beardsley, David Quinn, Bidisha Bisiwas and Jonathan Wilkenfeld, "Meditation Style and Crisis Outcom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6, Vol. 50, No.1, pp. 58-86.

^② Jacob Bercovitch and Scott Gartner, eds.,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ediation: New Approaches and Finding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20.

^③ 人们普遍接受并认为,调停者应该恪守中立,避免偏向。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一要求对调停者并非必然适用,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调停者持偏向进行调停,反倒更有益于冲突解决。Andrew Kydd, "Which Side Are You on? Bias, Credibility, and Medi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 4, 2003, pp. 597-611; Isak Svensson, "Bargaining, Bias and Peace Brokers: How Rebels Commit to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4, No. 2, 2007, pp. 177-194; 漆海霞、张鸿文:《国际冲突中调停者的偏向与调停效果》,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4期,第129-154页。

^④ Michael Grieg and Paul Diehl,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 84.

^⑤ Randa Slim, "Small-State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lgerian Mediation of the Iranian Hostage Crisis," 转引自 Jacob Bercovitch and Jeffrey Rubin, eds.,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ltiple Approaches to Conflict Management*, New York: St. Martin Books, 1992, pp. 206-231.

^⑥ Chenyiyi, "Why Appoint a Weak Mediator? A Strategic Choice to Reduce Uncertainty i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3, 2019, pp. 427-466.

取那些涉及影响力的调停举措,包括直接增进合作收益、使用威胁来改变冲突成本、为协议执行创造条件、降低冲突各方的信息非对称等;弱调停者则因影响力相对有限,多采取穿梭外交、主办和谈会议、提出建议、帮助冲突方专注于探寻解决办法等不涉及影响力的调停举措。^①

(三) 调停国与调停效果

通过实施调停,调停者对于国际冲突的缓和与平息,以及对冲突平息后和平状态的延续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学界在调停结果与协议保障阶段对于调停者的主要关切。鉴于国际冲突是否真正平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缓和,都是有待检验的非静态结果。有研究者就指出,国际冲突的调停结果具有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t)特点:经过调停,冲突方目前能够接受甚至满意于调停结果,但伴随调停结束与情势变更,其完全可能不再认同该结果,进而导致冲突复发。^②由此,学界就调停者影响调停结果的探讨,既在于消弭冲突,也在于维持冲突后的和平状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冲突降低的程度及轨迹既难以观测又极富动态,针对消弭冲突,调停努力是推动冲突的实质缓和还是程序缓和,本身也是相关研究的焦点议题之一。

苏珊娜·维尔娜(Suzanne Werner)等人发现,在调停者巨大压力下所形成的(冲突解决)协议更有可能失败,因为协议内容与当地的军事现实并不一致,这样,当有冲突方认为战斗获益将大于协议收益,冲突就有可能恢复。^③比尔兹利也持相似观点,认为调停者提供的人为激励往往能够产生显著的短期调停效果,却并非有益于长期维系和平。^④大卫·卡尔门特(David Carment)等人的研究结论从另一个角度对上述观点构成支持。他指出,解决引发冲突的根本问题才能真正平息冲突,因此长期而言,调停者不施加压力或者仅施加极小压力进而帮助冲突方所形成的协议将更加稳定。^⑤在这两方观点的基础上,伊萨克·斯文森(Isak Svensson)进一步发现,以大国、邻国等为代表的“权力型调停人”(power mediator)擅于使冲突各方达成和平协议,以小国、个人等为代表的“纯粹型调停

^① Kyle Beardsley, "Intervention Without Leverage: Explaining the Prevalence of Weak Mediator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5, 2009, pp. 272-297.

^② Jacob Bercovitch and Scott Gartner, eds.,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ediation: New Approaches and Findings*, pp. 96-113.

^③ Suzanne Werner and Amy Yuen, "Making and Keeping Pe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59, No. 2, 2005, pp. 261-292.

^④ Kyle Beardsley, "Agreement Without Peac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and Time Inconsistency Probl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2, No. 4, 2008, pp. 723-740.

^⑤ David Carment, Yiagadeesen Samy and Souleima El Achkar, "Protracted Conflict and Crisis Mediation: A Contingency Approach" in Jacob Bercovitch and Scott Gartner, eds.,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ediation: New Approaches and Findings*, pp. 216-240.

人”(pure mediator)则更擅长促成各方实现相关权益共享,若调停人兼具这两类属性,能够使得和平协议易于达成,并且有助于协议内容的持续履行。^①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研究者比较习惯于以调停阶段作为具体的观察视角,对国家充当国际冲突调停者的动机、策略和调停效能予以全过程、多维度分析。既有研究表明,一方面,国家介入国际冲突而提供调停,本质上是一种包括自利动机、追求特定目标、消耗本国资源并且运用相关策略的外交实践,旨在通过提供调停,来缓和乃至平息冲突,从而维护或者增进本国利益。另一方面,在国际冲突的调停实践中,调停国所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对其调停策略及举措构成制约,进而又影响调停效果。因此,大国和小国在调停国际冲突时,往往展现出不同的调停特点与调停效能。其中,既有研究主要以国际调停作为基本尺度,对小国实施国际调停的特点和效果予以分析,而着眼于小国本身这一视角的讨论却相对有限。比如,调停资源和影响力相对有限的小国,为什么会选择为国际冲突提供调停?这些国家如何通过介入冲突提供调停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介入冲突以及采取相应举措,对于小国自身又将产生哪些影响?相关问题仍有待探讨。

三、核心概念和假设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判断一个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其标准往往取决于比较的领域、范围及对象,需要就事论事,具体分析。其中,就国际冲突与调停而言,调停国的“大”或“小”实际上是对其调停能力的描述。这一能力与调停国所能够采取的调停举措息息相关,后者则往往取决于调停国能够用于调停的资源和影响力。对此,研究者指出,“影响力(leverage)是调停者参与调停的通行证”^②,大国进行国际调停时无疑“拥有更充足的资源(resources)来挥舞胡萝卜和大棒”^③。

本文尝试提出“小国调停者”这一概念,用以指代那些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不及冲突方(至少其中一方),以致相对缺乏调停资源和影响力、调停策略选择有限的国家。作为国际冲突的“弱调停者”(weak mediator)之一,小国调停者同样

① Isak Svensson, “Mediation with Muscles or Minds? Exploring Power Mediators and Pure Mediators in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Vol. 12 No. 2, 2007, pp. 229-248.

② I. William Zartman and Saadia Touval,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ower Politic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41, No. 2, 1985, p. 40.

③ Jacob Bercovitc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 82.

凸显调停资源、影响力以及策略选择的有限性,并在判定标准上体现出相对性。^①同时,立足主权国家的角度,小国调停者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介入冲突提供调停是经过选择的具体外交政策,以自利动机为根本导向;第二,调停资源和影响力的投入比重相对较高,影响调停决定及相关举措的因素多;第三,调停举措的具体目标及参与程度,更多取决于调停者而非冲突方的实际需要。

在国际冲突中,小国调停者的身影并非罕见。例如,在伊朗人质危机期间,阿尔及利亚作为调停国,在已经断交的美国与伊朗两国之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与联系沟通作用,其调停努力最终促成冲突双方签署《阿尔及尔协议》,从而使这场危机落下帷幕。^②又如,在 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斯里兰卡面向冲突双方所采取的积极的调停努力,对局势缓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助作用。^③除此之外,瑞典、土库曼斯坦、科威特等国也都曾作为小国调停者,介入国际冲突,并提供重要调停。

依照理论逻辑,调停国投入的资源和影响力越多,国际冲突得到缓和乃至平息的可能性相对更大,调停国也就更有可能实现相关国家利益。调停历史也的确表明,被称之为“操纵型或指令型策略”(manipulative / directive strategies)的“强硬的调停策略”(heavy-handed mediation tactics),对于中止国际冲突更为有效。^④而采用这类策略,显然需要调停国拥有丰富资源和显赫影响力。那么,调停资源和影响力相对不足、调停策略选择有限的小国调停者,为什么会介入冲突提供调停?怎样实现自身利益诉求?面临哪些不确定因素?对此,本文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假设 1:国家利益受到国际冲突的影响越大,则第三方国家越有可能介入冲突,其成为小国调停者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假设 2:国家利益受到国际冲突的影响越大,小国调停者所采取的外交应对举措就越多样,也越有可能产生超出政策预期的复杂影响。

① 学界用“弱调停者”来描述那些调停能力相对有限的国际冲突调停者,如区域性组织、弱小国家(Weak States)、个人、非政府组织等。在比尔兹利看来,被称为弱调停者,意味其只有有限的胡萝卜和大棒用于调停。陈一一认为,调停者的“强”或“弱”是相对的,是指其调停资源和影响力相较于其他潜在调停者的相对可用性(Relative Availability)。参见 Kyle Beardsley, “Intervention Without Leverage: Explaining the Prevalence of Weak Mediator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5, 2009, pp. 272-297; Chen Yiyi, “Why Appoint a Weak Mediator? A Strategic Choice to Reduce Uncertainty i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3, 2019, pp. 427-466。

② Randa Slim, “Small-State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lgerian Mediation of the Iranian Hostage Crisis.”

③ Urmila Phadnis, “Ceylon and Sino-India Border Conflict,” *Asian Survey*, Vol. 3, No. 4, 1963, pp. 189-196.

④ Kyle Beardsley, “Intervention Without Leverage: Explaining the Prevalence of Weak Mediator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5, 2009, pp. 272-297.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提出以下变量关系:首先,自变量是国际冲突对于第三方小国国家利益的影响程度,更确切地讲,即被第三方小国视为关键的国家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冲突的影响。其次,控制变量是小国调停者的调停动机以及相关的外交应对举措。再次,因变量是小国调停者介入冲突提供调停所产生的多层次影响,既包括对国际冲突的消弭作用,也包括对于调停国本身的复合影响。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以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提供调停为案例进行分析。根据前文定义,以色列是俄乌冲突中的小国调停者。在此基础上,一则,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宣称其调停俄乌冲突的“全部动力都源于确保以色列安全”^①,从而表明以色列就俄乌冲突对本国利益影响程度的理解,满足本文的自变量设定。另则,以色列所采取的一系列外交应对举措,对俄乌冲突和本国政治产生诸多影响,有利于我们观察因变量的变化。再则,以色列调停动机的恒定性和应对举措的多样性,也有益于我们对控制变量的观察。

四、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实证分析

以色列对不断升温的俄乌局势保持高度关注,并多次表态愿为促进缓和提供帮助。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次日,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同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通话,请求以色列对俄乌冲突进行调停,并表示希望在耶路撒冷同俄罗斯进行谈判。两天后,贝内特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俄罗斯暂停军事行动,并提议以色列作为调停国。^②由此,以色列开始介入俄乌冲突调停,展开一系列外交努力。

(一)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分析

以色列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同俄罗斯差距显著,较乌克兰则各有千秋。^③这意味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提供调停,无疑是作为小国调停者——其缺乏充足的资源和影响力来推进调停,可选用的调停策略和举措也相对有限。既然如此,以色列为何迅速回应了乌克兰的调停请求,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便果断介入,扮演起调停者的角色?事实上,贝内特所坦言的“(调停的)全部动力源于确保以色

^① “Bennett: My Mediation Helped, But I’m Wrapped in Israel’s Flags, Not Ukraine’s,”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11,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iveblog_entry/bennett-my-mediation-helped-but-im-wrapped-in-israels-flag-not-ukraines/, 上网时间:2022年4月20日。

^②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Naftali Bennett,” *President of Russia*, February 27, 2022, <http://en.kremlin.ru/catalog/countries/IL/events/67875>, 上网时间:2022年4月13日。

^③ 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乌克兰。据世界银行统计,2020年以色列GDP总量约合4,071亿美元,乌克兰则约合1,555亿美元。但在国土、资源及人口等国家禀赋上,以色列却远逊于乌克兰。就国际影响力而言,两国分别在各自所在地区,扮演越来越突出的角色。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上网时间:2022年4月13日。

列安全”^①,已经大致道出了以色列积极介入冲突的根本动机。更确切地说,在以色列看来,俄乌冲突明显威胁甚至冲击到本自身关键利益,因此必须有所作为。

从直接或间接受到俄乌冲突影响的以色列国家利益来看,以色列调停冲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确保维护自身国家安全所需的重要条件。国家安全议题占据以色列政治议程的绝对中心。伴随该国地缘政治环境因《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而显著改善,伊朗日益成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主要地缘关切。而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与打击伊朗地区影响力两项焦点议题,都与俄罗斯息息相关。因此,避免俄罗斯因俄乌冲突而在这两项议题上陷以色列于被动,以继续保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成为以色列介入调停的根本动机。

一方面,越境空袭叙利亚境内被认为与伊朗相关的军事目标,是以色列打击伊朗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举措,而空袭成行的前提条件则在于,驻叙利亚的俄罗斯部队不使用其防空系统拦截以军战机。因此,在以色列高层看来,俄罗斯对于以色列国家安全具有直接战略意义。贝内特对此直言不讳:“就调停俄乌冲突……我所关心的是以色列民众的利益,包括在叙利亚自由行动,(使我们)能够在更靠近源头的地方打击伊朗。”^②以色列防长本尼·甘茨(Benny Gantz)也指出,“考虑到以色列与俄罗斯共享地区边界,特别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空域,(以色列对俄乌冲突的应对)实际上是正确的”^③。由此,以色列以调停者身份介入俄乌冲突,对于其实现国家安全目标,能够至少带来两项特别优势:其一,以色列可以相对名正言顺地秉持中立,降低与俄罗斯产生矛盾的可能,以免不利于以军的叙利亚空域飞行权;其二,以色列可以在冲突期间相对稳定地同俄罗斯保持交流沟通,更有效传递本方关切,把握对方考量。

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伊朗的密切关系以及同伊朗在核能领域的技术合作,成为以色列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外交着力点之一。在拜登政府表态愿意重返伊核协议、美伊关系出现缓和迹象的背景下,俄罗斯对于伊朗的影响力,以及在伊核协议中的谈判方身份,对以色列实现其阻止伊朗拥核的目标显得愈发重要。事实上,贝内特飞赴莫斯科调停冲突期间,除俄乌局势外,还同普京讨论了伊核问题,表明了以色列对于伊核协议维也纳谈判的立场。^④ 贝内特也曾公开表示,

① “Bennett: My Mediation Helped, But I’m Wrapped in Israel’s Flags, Not Ukraine’s”.

② Ibid.

③ “Defense Minister Benny Gantz Discusses Israel’s Strategic Challenge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pril 11, 2022,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defense-minister-benny-gantz-discusses-israels-strategic-challenges>, 上网时间:2022年4月24日。

④ “Bennett Returns to Israel After Whirlwind Trip to Meet Putin, Brief Germany’s Scholz,”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6,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bennett-returns-to-israel-after-whirlwind-trip-to-meet-putin-germanys-scholz/>, 上网时间:2022年4月25日。

反对重启伊核协议是其调停俄乌冲突的利益考量之一。^① 值得指出的是,几近取得成功的维也纳谈判因“外部因素”而暂停,而不少观察者认为,该“外部因素”很可能与俄罗斯于2022年3月5日提出的“美国应保证制裁不会损害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贸易与合作”这一要求有关。^②

第二,尽可能弱化冲突对于以色列经济的冲击和威胁。俄乌冲突给以色列经济造成的现实与潜在影响,是以色列内阁围绕冲突开展态势评估的主题之一。^③ 原因在于,以色列同冲突双方特别是乌克兰拥有紧密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发展难以承受俄乌冲突长期持续的消极影响。首先,在以色列的工农业进口产品中,乌克兰产品占比较高。乌克兰长期是以色列主要的粮食供应国,其出口谷物在以色列谷物消费中占比约50%。^④ 又如,以色列建筑业的主要材料大多有赖于乌克兰供应,每年从乌克兰进口的热轧钢、钢筋、钢坯、胶合板等材料都高达1.2亿美元。^⑤ 其次,以乌双方经济合作密切且深入,且后者的作用在短期内难以替代。以作为以色列经济发展引擎的高科技产业为例,由于本国技术型劳动力不足,不少以色列科技企业都选择将生产环节外包,其中约45%都集中在乌克兰。^⑥ 就以俄经济关系而言,俄罗斯是以色列最主要的原油供应国之一,且两国经贸往来也保持增长势头。据统计,1995年至2020年间,以色列对俄罗斯出口额的年均增速达4.17%,俄罗斯对以色列出口额的年均增速则为6.6%。^⑦ 由此,鉴于冲突双方都是重要的经济伙伴,就经济角度而言,以色列显然拥有充足的动力来提供调停。

第三,帮助散居犹太人,彰显和巩固以色列犹太国家的合法性。现代以色列

① “Bennett: My Mediation Helped, But I’m Wrapped in Israel’s Flags, Not Ukraine’s.”

② Javad Heira-Nia, “Israel Won’t Break with Russia over Ukraine. Here’s Why,” *Atlantic Council*, March 30, 2022,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iransource/iran-wont-break-with-russia-over-ukraine-heres-why/>, 上网时间:2022年4月16日。

③ “PM Bennett Holds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Escal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srael)*, Feb. 24, 2022,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news/spoke_ukraine240222; “PM Bennett’s Remarks at the Start of the Weekly Cabinet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rael)*, Feb. 27, 2022,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news/pm-bennett-s-remarks-at-the-start-of-the-weekly-cabinet-meeting-27-feb-2022>, 上网时间:2022年4月13日。

④ Shimon Briman, “The ‘Ten Plagues’ Facing Israel If Russia Invades Ukraine,” *Haaretz*, February 10, 2022,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israel-russia-ukraine-invasion-ten-plagues-1.10599376>, 上网时间:2022年4月12日。

⑤ Shimon Briman, “The ‘Ten Plagues’ Facing Israel If Russia Invades Ukraine,” *Haaretz*, February 10, 2022,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israel-russia-ukraine-invasion-ten-plagues-1.10599376>, 上网时间:2022年4月12日。

⑥ Ibid.

⑦ “Israel-Russia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https://oec.world/en/profile/bilateral-country/rus/partner/isr>, 上网时间:2022年4月26日。

国诞生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根本信条是：犹太民族在被其视为民族家园的土地上建立国家，从而使得因大流散而散居世界的犹太人能够结束漂泊，回归故土。^① 以色列的立国法律文本《以色列独立宣言》(*Israeli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将此表述为“基于历史和传统联系，世世代代的犹太人为加强他们与古老家园的联系一直奋斗不息……为解决犹太民族无家可归和缺乏主权这一问题，有必要重新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并写明“这个犹太人国家将对所有犹太人敞开大门，并且确保犹太民族在国际大家庭中享有平等的地位”。^② 在以色列语境中，其立国的根本任务就是为犹太民族提供保护和帮助。换言之，这一任务是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以色列的国家合法性基础。因此，帮助那些陷于困境的散居犹太人，以色列责无旁贷。乌克兰是全球犹太人主要聚居国之一，境内共有约 20 万~40 万犹太人(乌总统泽连斯基本人就是犹太人)，大多聚居在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城市。^③ 这些城市正位于此次冲突的中心区域。因此，就兑现和彰显国家合法性而言，以色列也需要介入俄乌冲突，从而竭尽所能地为乌克兰犹太人提供援助。

第四，回应本国民众关切，小心维护以色列社会和政局的相对稳定。近年来，以色列社会的分裂态势愈发明显，不同社会群体的理念及诉求满布分歧，且难以兼容。^④ 在此背景下，聚合民心、维护团结就成为当前以色列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的俄裔犹太人在以色列国民中占比约 15%，总数超过 130 万人，是以色列社会的主要群体之一。^⑤ 俄乌冲突爆发后，76% 的以色列民众支持乌克兰，并通过集会游行、网络讨论等方式，表达对于乌克兰的同情和担忧。^⑥ 因此，面对国内重要社群高度关注、且引发国民情绪高涨的俄乌冲突，寻求弥合社会分歧、凝聚国民共识的以色列政府，势必会对这一重大议题作出谨慎反应。而介入冲突、居中调停，既能体现以方关切，又不用明确在冲突双方做出选择，相对而言，是更能平衡以色列各方期待和诉求的政策选项。

^① 参见 Theodor Herzl, *The Jewish Stat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9, pp. 2-16.

^②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Knesset*, <https://main.knesset.gov.il/en/about/pages/declaration.aspx>,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13 日。

^③ Arnold Dashefsky and Ira M. Shekin, eds.,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2020*,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2022, p. 290. 由于就犹太人身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关于散居各国的犹太人口的估值存在明显差别。

^④ 以色列社会严重撕裂生动地体现在该国议会“三年五选”的奇异景象，也可以从由 8 个政党组成、被称为“拼凑班子”的现任政府窥得一二。Ari Rabinovitch, “Explainer: Who’s Who in Israel’s New Patchwork Coalition,” *Reuters*, June 15, 2021.

^⑤ Arnold Dashefsky and Ira M. Shekin, eds.,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2020*, pp. 286-288.

^⑥ “A Majority of Israeli Support Ukraine in the War with Russia,”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5, 2022,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politics-and-diplomacy/article-699374>,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27 日。

由此,从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可以看出,尽管作为冲突第三方的国家明显缺乏推进调停所需的资源、影响力和策略选择,但当国际冲突同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尤其是关乎其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等关键利益时,这类国家同样富有充足动力介入冲突之中,也就越有可能成为小国调停者。

(二)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具体举措

由于国家关键利益倍受俄乌冲突波及,作为冲突第三方的以色列介入其中,进行调停。但作为小国调停者,以色列如何在调停举措选择受限的情况下,通过介入冲突提供调停来实现目标,从而实现其利益诉求?这实际上也是大多数小国调停者都会面临的现实考验。对此,以色列在介入俄乌冲突的过程中,除采用信息传递、促进沟通、提供建议等调停举措外,还分别面向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了诸多务实外交举措,即通过调停这一外交努力推动实现特定目标。

面向国际社会与国内民众,以色列选择接受乌克兰的调停请求,为俄乌冲突提供调停。鉴于是否接受调停请求往往被认为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形象^①,而且俄乌冲突本就深受以色列民众关注,并同以色列国内重要社群密切相关。因此,面对乌克兰的调停请求,以色列有必要采取积极回应。同时,接受调停请求还有深层次考虑:外界普遍对调停国抱有中立、无偏见的身份认知和预期,故成为俄乌冲突的调停国,实则有利于以色列借“恪守中立”之名来对冲各方压力,从而紧扣本国利益,进一步开展活动。公开数据显示,以色列成为冲突调停国以来,贝内特与普京联络次数多达8次,与泽连斯基的联络次数则更多。在此期间,作为俄乌双方的信息传递渠道,“以色列的定位在于持续同双方进行坦诚、开放的沟通交流,以利取得调停成果”^②。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曾提议乌克兰应该接受俄罗斯的要求从而结束冲突”^③,这表明以色列的调停举措可能不止于信息传递,还曾尝试直接向冲突方提供建议。

面向俄罗斯,以色列的相关外交动作极为谨慎和务实,在小心避免对俄罗斯造成冒犯或损害的同时,注重维护本国利益。由于以色列认为其实现国家安全有赖于俄罗斯的善意与支持,并且俄罗斯的确有助于缓解乌克兰犹太人所遭

^① Michael Grieg and Paul Diehl,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p. 81.

^② “Bennett: Russia No Longer Wants to Replace Zelensky or Demilitarize Ukraine,”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21, 2022, <https://www.jpost.com/breaking-news/article-701889>, 上网时间:2022年5月2日。

^③ 参见 Jonathan Lis, “‘Bennett Wants Ukraine to Surrender’, Ukraine Senior Officer Says Israel’s Mediation is Useless,” *Haaretz*, March 11, 2022,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bennett-wants-ukraine-to-surrender-official-says-israel-s-mediation-useless-1.10668879>; “Russia-Ukraine War: ‘Bennett Wants Us to Surrender’, Says Senior Kyiv Official,” *Middle East Eye*, March 11, 2022,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russia-ukraine-war-israel-bennett-wants-surrender-claims-ukraine-official>, 上网时间:2022年5月2日。

受的困境。因此,基于调停者身份而恪守善意中立、尽量不触犯对方,构成了以色列介入冲突过程中对俄外交的基调。

以色列采取的具体举措包括:其一,谨慎措辞,避免直接指责和批评俄罗斯。贝内特涉及俄乌冲突的公开言论极为考究,从不使用指责性或容易被视同谴责语义的表述,而只是以“震惊于恐怖景象”“人道主义后果”“乌克兰的困难事件”等中性表述,强调其对于乌克兰局势和民众的关切。^① 需要指出,虽然以色列时任外交部长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针对俄乌冲突屡屡严厉指责俄罗斯,但考虑到贝内特才是代表以色列真正实施调停的主要人物,贝内特的言行显然更具政策指向性。其二,迟迟不肯伙同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冲突爆发后,以色列没有立即对俄罗斯施以经济制裁,甚至因此被冠以“俄罗斯寡头和资本的避风港”之名。^② 在欧美多国再三要求和敦促下,以色列才开始采取部分制裁措施。其三,若被迫明确反对俄罗斯,则同时做出明显保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暂停俄罗斯成员资格的投票中,以色列虽然迫于压力而追随欧美各国投票赞成,但也声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一个极端主义的、道德有缺陷的、充满偏见的,并且本质上是反以色列的机构”,从而在事实上弱化了其投票的意义。^③ 此外,以色列尤显务实的举措则在于,贝内特在与普京的数次会谈中,多次谈到叙利亚空域、伊核协议、乌克兰犹太社团等与调停并非直接相关的议题,显然是借机强调确保本国利益。

面向乌克兰,以色列高调提供了内容丰富但程度有限的物质和政治援助,以彰显其对乌克兰民众的关切与支持。鉴于以乌两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与国民联系,但自身又面临来自欧美与俄罗斯的双向压力,以色列在调停冲突的同时,高调并且巧妙地对乌克兰施以援手。其一,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了丰富的人道主义援助,但严格拒绝后者的进攻性武器援助请求。据统计,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形式包括提供救援物资、接收难民、援建并运营野战医院等,援助食品、药品、发电机、生活用品等物资超百吨^④,以期有效降低冲

^① “Bennett Condemns Bucha Massacre Without Accusing Russia of War Crime,” *The Jerusalem Post*, April 5, 2022,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703288>, 上网时间:2022年5月2日。

^② Adi Cohen, “Putin’s Oligarchs Rush for Israeli Luxury Rentals, Preferably in Cash,” *Haaretz*,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HIGHLIGHT.MAGAZINE-name-your-price-russian-oligarchs-expensive-rush-for-luxury-homes-in-israel-1.10693682>, 上网时间:2022年5月3日。

^③ “UN Votes to Suspend Russia from Human Rights Council, with Israel’s Backing,”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7,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un-votes-to-suspend-russia-from-human-rights-council-with-israels-backing/>, 上网时间:2022年5月3日。

^④ “Israel Sends Humanitarian Aid to Ukrain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rael)*, March 1, 2022,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news/israel-sends-humanitarian-aid-to-ukraine-1-mar-2022>, 上网时间:2022年5月5日。

突对于乌克兰民众的冲击。但同时,面对乌克兰希望获得先进进攻武器、“铁穹”反导系统、“飞马”间谍软件等军用设备援助的请求,以色列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为此,乌克兰政府指责以色列“害怕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几架飞机和反导系统,以致不敢向我们提供进攻武器”^①。其二,以色列多次在不同外交场合宣扬对于乌克兰局势的关注和担忧,并尽可能满足乌克兰方面的政治支持诉求。以色列在介入冲突期间,包括贝内特在内的以色列高层屡屡利用外事活动就乌克兰局势发声,强调对乌克兰民众的关切和支持。例如,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Issac Herzog)在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谈话时提到,“乌克兰战争是一场震惊世界的人道主义灾难,我们不能对那里人们的苦难遭遇无动于衷”^②。时任以外交部长拉皮德则在访问罗马尼亚时强调,“以色列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尽其所能帮助达成和平解决方案”^③。同时,面对乌克兰所需要的政治支持,以色列也尽可能地予以满足。例如,以色列同意泽连斯基向以色列国家议会发表视频演说,并向全国全程直播。^④

上述这一系列外交举措展现出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调停与其他外交行为并非割裂,而是共同构成了以色列介入冲突护持利益的系统化举措。受限于自身的调停资源和影响力,以色列的调停效果实则高度不确定,因此,其难以完全寄望于通过促进冲突平息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这样,紧扣本国的利益和诉求,以色列以调停国的身份介入冲突后,还分别面向冲突双方进行了诸多极为务实的外交活动,寻求以此来降低乃至避免俄乌冲突对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二,以色列面向冲突双方的外交举措看似恪守中立,实际却清晰表明了态度和立场。调停国的身份使得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俄乌冲突选择秉持中立。据以方理解,不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武器、不随欧美诸国严苛制裁俄罗斯、避免公开严厉批评俄罗斯,都属于秉持中立的范畴。考虑到冲突双方存在国力差距,这样的中立姿态显然更有利于实力占优的俄罗斯。这样,尽管以色列强调居

^① “Ukraine Envoy: Israel Is Scared of Russia, Isn’t Sole Mediator, Shouldn’t Be Neutral,”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11,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ukraine-envoy-israel-is-afraid-of-russia-and-should-drop-neutral-position/>, 上网时间:2022年5月7日。

^② “President Herzog Meets with Turkish President Recep Tayyip Erdoğan in Ankar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rael)*, March 9, 2022,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news/president-herzog-meets-with-turkish-president-erdogan-9-mar-2022>, 上网时间:2022年5月8日。

^③ “FM Lapid Meets Romanian FM Bogdan Auresc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rael)*, March 13, 2022,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news/fm-lapid-meets-romanian-fm-aurescu-13-mar-2022>, 上网时间:2022年5月8日。

^④ “In Video Address to the Knesset, President Zelensky Says Russia Planning ‘Final Solution’ for Ukraine,” *Knesset News*, March 20, 2022, <https://m.knesset.gov.il/EN/News/PressReleases/Pages/press20322y.aspx>, 上网时间:2022年5月7日。

中调停、严守中立,但其面向冲突双方的外交举措清晰表明,以色列对俄罗斯的忧惧超过了其对乌克兰的同情。对此,泽连斯基在对以色列国家议会的公开视频演说中,批评以色列的冷漠(indifference)将会置乌克兰于绝境,其不选边的调停(mediation without choosing a party)是善恶不分。^①

第三,以色列所采取的相关外交举措保持动态,根据情势和议题灵活调整。例如,虽然以色列在冲突初期选择不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但迫于多方压力,最终加入了制裁行列。又如,以色列曾坚决杜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种类的武器援助,但此后改变立场,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头盔、防弹背心等防御性装备。^②可见,在自身利益诉求和所受现实制约的共同作用下,以色列动态调整针对俄乌双方的具体外交政策,彰显务实。

更进一步看,这些应对举措及其突出特征,也生动折射出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所面临的多重制约。

首先,作为俄乌冲突中的小国调停者,以色列的调停实践显然受到自身调停资源和影响力相对不足的牵制。因而在调停过程中,以色列难以采用改变冲突方预期、安排冲突方进入和谈、提供冲突解决框架等涉及激励和威胁的各类举措,而是更多采取交换信息、推动沟通等调停举措,来促进而非主导冲突双方自主探索解决方案。

其次,以色列针对俄乌冲突的外交应对,深受以色列同冲突双方关系特别是以俄关系的掣肘。同俄罗斯和乌克兰保持友谊对以色列而言都非常重要。其中,乌克兰作为以色列难以替代的农业和工业产品进口国,对于后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正常运转具有突出影响。同时,以巴比亚尔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Babi Yar Holocaust Memorial Center)遭炮击引发以色列群情激奋为例,以乌两国民间的紧密联系和频繁互动,使得双边友好关系并非仅限于国家层面,而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③因此,拉皮德在谈及俄乌冲突时强调,以色列具有道义、历史和道德责任,向乌克兰民众提供援助。^④相比之下,以俄关系对以色列的重要性甚至更

① “Full Text: Ukraine President Zelensky’s Speech to Israeli Lawmakers,”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20,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full-text-ukraine-president-zelenskys-speech-to-israeli-lawmakers/>, 上网时间:2022年5月9日。

② “Israel to Provide Ukraine with Protective Gears — Gantz,” *The Jerusalem Post*, April 20, 2022,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704711>, 上网时间:2022年5月9日。

③ Dan Williams, “Israel Condemns Attack Near Kyiv Holocaust Memorial, Doesn’t Mention Russia,” *Reuters*, Mar. 1,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israels-yad-vashem-condemns-russian-strike-near-kyiv-holocaust-monument-2022-03-01/>, 上网时间:2022年5月9日。

④ “Briefing by FM Lapid on the Backdrop of Hostilities in Ukrain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rael)*,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news/briefing-by-fm-lapid-on-the-backdrop-of-hostilities-in-ukraine-28-feb-2022>, 上网时间:2022年5月9日。

胜一筹。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以色列认为以俄双边关系直接事关国家安全,是本国最为重要的战略和外交议题之一。并且,以色列和俄罗斯同样也具有紧密的民间联系及往来;以色列拥有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及后裔,俄语更是该国第三常用语种;莫斯科则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外犹太人社团。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前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普京私交甚好,使得以俄关系在其任期之内,还拥有领导人层面的积极因素。尽管内塔尼亚胡目前在野,但考虑到他在以色列政坛拥有显赫影响且表现活跃,高层私人友谊对于以俄关系的增益作用依然值得关注。

最后,美国的看法及态度是以色列就俄乌冲突采取外交举措时无法忽视的重要考量。防长甘茨在阐述以色列的核心战略利益时,将维系美以独特纽带(special bond)、获得美国鼎力支持,列为以色列首要战略利益。^①换言之,维系美以特殊关系被以色列视为国家关键利益,是其最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和考量。在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过程中,由于美俄两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针锋相对,美国因素对于以色列相关外交活动的突出影响不容忽视。这样的影响一方面通过以色列的外交举止间接体现。介入俄乌冲突后,以色列屡屡特意强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在危机中发挥努力”^②,并且十分注重就调停事宜同美国保持紧密沟通^③,彰显出在俄乌冲突议题上对美国的高度重视乃至依赖。另一方面,这些影响直接表现在以色列的政策选择上。例如,以色列起初选择不对俄罗斯施以经济制裁,即使招致西方政界和舆论的广泛批评也仍然不作调整,但在美国副国务卿纽兰要求以色列加入西方国家的制裁行列后,以色列转变态度,开始采取制裁措施。^④可见,确保相关外交举措不引发美国不满,实际同样也构成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一项基本考量。

从以色列的上述举措可以看出,旨在确保本国利益的小国调停者在介入国际冲突后,由于其有限的调停策略无法确保本国目标和诉求得以实现,因此,除调停举措外,小国调停者还会更为务实地面向冲突方进行自利性的其他外交活动。

① “Defense Minister Benny Gantz Discusses Israel’s Strategic Challenges.”

② Dan Williams and Maayan Lubell, “Israeli PM Meets Putin in Moscow, then Speaks with Zelensky by Phone,” *Reuters*, March 6,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israeli-pm-bennett-meets-putin-moscow-discuss-ukraine-crisis-2022-03-05/>,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0日。

③ “US in ‘Hourly Contact’ with Israeli on Russia-Ukraine War, Envoy Says,”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16, 2022, <https://www.jpost.com/international/article-701406>,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1日。

④ 纽兰的原话是:“(以色列)不会想成为资助普京战争的‘脏钱’最后的避风港”,“我们要求世界上每一个民主国家加入我们对普京实施的金融和出口制裁。”“US Officials Warns Israel: ‘Don’t Be Last Haven for Dirty Money Fueling Putin’s War’,”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11,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us-official-warns-israel-dont-be-last-haven-for-dirty-money-fueling-putins-war/>,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0日。

（三）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影响探析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及其相关外交举措产生了广泛且复杂的影响,既指向冲突本身,更涉及以色列的外交和内政事务。

首先,围绕俄乌冲突,从调停效果看,以色列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突缓和起到积极作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作为最早介入调停的国家之一,通过运用穿梭外交、信息传递、推动沟通等调停举措,使得冲突双方拥有了一条稳定高效的信息交流渠道,从而为增进俄乌有效沟通、推动冲突的外交解决增添有利条件。贝内特就此强调,“(调停)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成果”^①。乌克兰方面也赞赏以色列的调停努力旨在寻求和平,艰难而高尚。^②但客观而言,以色列除了在信息传递、增进沟通等推动冲突的程序缓和方面发挥作用外,尚没有证据表明,其对于促进俄乌冲突的实质缓和起到直接和显著的影响。这一观察也可以从俄罗斯官方的相关表态得到侧面印证。面对同样作为俄乌冲突小国调停者的土耳其和以色列,在涉及前者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公告中,开头便写明“普京感谢土耳其为调停冲突所做的努力”^③;但在关于以色列的公告中,却没有类似表述或者评价,而只有对以色列施展调停的极为简要的概述。

与有限的调停效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以小国调停者的身份介入俄乌冲突,以色列相当程度地实现了自身的利益关切与诉求。其一,通过介入调停并竭尽所能援助乌克兰犹太人,以色列积极回应了本国民众关切,并且彰显出作为犹太国家的合法性根基和使命责任,由此较为成功地应对了俄乌冲突给以色列社会与政局带来的直接挑战。其二,藉由面向俄罗斯的外交努力,以色列仍然拥有在叙利亚空域的自由行动权^④,并就伊核问题同俄罗斯保持沟通,从而使得国家安全这一核心关切获得确认。当然,鉴于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以色列的相关外交活动能否真正完全规避冲突所导致的不利影响,还有待观察分析。

其次,针对以色列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而论,介入俄乌冲突及其诸多举措,未必有利于以色列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其中,对于以乌关系,以色列所展现的中立姿态,尤其是以“调停国恪守中立”为借口屡次拒绝乌克兰的武器援助请求,远不符合乌克兰方面对于以色列进行有偏向调停的预期,以致多次引发乌克兰高层的激烈指责。泽连斯基曾毫不客气地指责贝内特“对乌克兰支持不

① “Bennett: My Mediation Helped, But I’m Wrapped in Israel’s Flags, Not Ukraine’s.”

② “Zelensky Chief of Staff Lauds Israel ‘Brave’ Mediation Efforts, New Refugee Rules,”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14,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zelensky-chief-of-staff-lauds-israels-brave-mediation-efforts-new-refugee-rules/>,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0日。

③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of Turkey Recep Tayyip Erdogan,” *President of Russia*, April 1, 202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118>, 上网时间:2022年6月28日。

④ 公开信息显示,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以来,以军每月都对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空袭,而且还曾罕见地在白天发动袭击。这表明,俄罗斯未阻止以空军在叙利亚空域开展军事行动。

够……并未身披我们的旗帜”^①。在对以色列国家议会的视频演说中,泽连斯基甚至暗示以色列所采取的调停举措是“算计”(calculations)。^② 这样的龃龉体现了两国间明显的立场差异,更揭示出以色列支援乌克兰的实际限度。

对于以俄关系,以色列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逐渐增大,在以俄两国间激起涟漪。特别是以色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投票与表态,以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装备,引发以俄两国外交风波。2022年4月初,以色列投票支持暂停俄罗斯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时任以色列外长拉皮德宣称投赞成票的原因在于“俄罗斯发动战争入侵乌克兰,并且杀害平民”^③。对此,俄罗斯外交部于4月16日表示拉皮德的言论令人遗憾,并称乌克兰议题是拉皮德用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注意力的拙劣伪装。^④ 仅仅一天后,普京致信贝内特,要求其依照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承诺,将耶路撒冷城中的亚历山大庭院(Alexander Courtyard)交由俄罗斯控制。^⑤ 4月20日,防长甘茨宣布,以色列将应乌克兰请求,向其提供防御性装备。次日,俄罗斯驻以大使警告称,“如果以色列提供防御性武器给乌克兰,俄罗斯将视情况予以回应”^⑥。可见,以色列关于俄乌冲突的立场逐渐向乌克兰倾斜,使得以俄两国关系将面临考验。

而对于以美关系,以色列就俄乌冲突采取了异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应对举措,表明美以特殊关系已经受到俄罗斯因素的显著影响。俄乌冲突是美俄竞斗的具体表征,是被美国视为攸关本国利益的重大议题。依照逻辑和经验,面对这类议题,将美以特殊关系视为战略基石的以色列,应该坚定站在美国一边,毫不犹豫地给予全力配合与支持。然而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以色列却因国家安全受到俄罗斯牵制,没有同美国保持同一步调。对于以色列的选择,美国多次表明不满。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加极具象征意义的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峰会期间,公开向贝内特表示,“美国感谢盟友和伙伴为制止乌克兰民众灾难遭遇的一切努

① “Zelensky Says He Is Disappointed by Bennett: ‘I don’t Feel He is Wrapped in Our Flag’,”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3,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zelensky-signals-he-expected-greater-israeli-support-ties-tested-in-times-of-need/>,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3日。

② 对于泽连斯基这句表述的翻译,其他国家的媒体多采用“calculations”甚至“calculations of interests”,而以色列时报则采用了“premediation”一词。

③ “UN Votes to Suspend Russia from Human Rights Council, with Israel’s Backing.”

④ “Russia Says Israel Using Ukraine Invasion as ‘Distraction’ from Palestinian Issue,” *Haaretz*, April 16, 2022,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russia-says-lapid-using-ukraine-invasion-as-distraction-from-palestinian-issue-1.10745497>,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5日。

⑤ “Putin Demands Russia Gain Control of Jerusalem Church as Promised,” *The Jerusalem Post*, April 18, 2022,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704490>,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8日。

⑥ “Russian Envoy: We’ll ‘Respond Accordingly’ If Israel Gives Ukraine Defensive Gears,”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21,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russian-envoy-well-respond-accordingly-if-israel-gives-ukraine-defensive-gear/>,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6日。

力,特别感激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努力”,但对以色列的调停实践却只字未提。^① 美以之间的这次龃龉,揭示出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更深层次的战略意义:由于驻叙俄军同以色列能否实现关键利益息息相关,俄罗斯因此而能够通过威胁和压力,来有效影响以色列的政策选择。这无疑是在美以特殊关系中打入了一枚楔子,进而也意味着在重大议题上以色列可能会迫于自身的国家安全诉求与考量,而难以对美国作出积极回应。

再次,面对俄乌冲突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也折射出以色列外交政策的现实挑战。甘茨在谈及以色列核心战略利益和俄乌冲突时指出,“以色列是需要考虑很多地区因素的小国……维系美以特别纽带是首要战略利益”^②。确切地说,以色列之所以“需要考虑很多地区因素”,是因为它认为这些因素直接指向其国家安全。甘茨的表述实则阐明了以色列的基本战略逻辑:依赖于大国的关键保障,来实现自身高企的国家安全诉求。据此,确保与大国盟友维持紧密友谊,也就成为以色列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目标。那么,如果国家安全诉求的关键保障来自不只一个大国,而且这些大国之间又矛盾尖锐甚至爆发冲突,以色列又该作何选择? 在此轮俄乌冲突中,以色列就遇到了这样的棘手问题:美国是以色列最为依赖的大国盟友,然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却使得其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极具现实影响。由于需要在同美俄双方关系间谨慎平衡,以色列尽管应对俄乌冲突尤为小心翼翼,却仍不免左支右绌。事实上,伴随美国一定程度地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地区格局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调整期,可以预见,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难免还会遭遇此类挑战。

最后,就内政而言,对于俄乌冲突的应对,再度暴露了本届以色列政府缺乏内部共识这一缺陷,进而折射出以色列社会的碎片化特征及其深层诱因。本届政府组建之初,就因所含政党众多且彼此理念差异巨大,而被认为难以形成内聚力和政策共识。此次以色列应对俄乌冲突,更将这一特点暴露无遗。以总理贝内特和外长拉皮德对于冲突的态度大相径庭,前者主张谨慎处理同各方关系以确保实现本国利益,后者则主张与欧美国家步调一致。以色列内阁由此而产生“调停派”和“制裁派”两条政策思路,难以调和。同时,以色列内政部长关于限制接收乌克兰入境人员数量、向其收取保证金、拒绝提供医疗保险等措施,罕见地引发了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卫生部长、大流散事务部长等多名内阁成员的公开

^① “Statements by PM Bennett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rael)*, March 27, 2022,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news/statements-by-pm-bennett-and-us-secretary-of-state-blinken-27-mar-2022>,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1日。

^② “Defense Minister Benny Gantz Discusses Israel’s Strategic Challenges”.

批评。^①可见,对于如何妥善应对俄乌冲突,以色列政府内部显然并未形成统一意见。

进一步看,贝内特和拉皮德之间的路线分歧,实则揭示了以色列社会对于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这一立国意识形态存在的巨大张力。贝内特及其支持者秉持右翼、宗教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观,以犹太性(jewishness)和犹太人为优先,在国家治理中注重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与宗教理念,外交实践则强调确保犹太国家利益。相比之下,拉皮德及其支持者依循中左翼、世俗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观,以建设现代世俗犹太国家为旨归,其国家治理强调确保以色列的世俗国家基本属性,寻求推动国家实力增长,其外交实践则注重以色列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既追求本国利益,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可见,仅仅是社会主流群体中,关于犹太国家的属性、宗旨及治理思路的理解就不乏分歧和矛盾。而放眼整个以色列社会,以教俗、意识形态、民族以及犹太族裔等不同标准而区分的社会群体,其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解和诉求则更加多样且充满张力。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社会越来越呈现碎片化特点。

从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所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出,面对关乎自身关键利益的国际冲突,小国调停者采取了多样的冲突应对举措。这些举措除了围绕其预定目标一定程度地发挥效用外,还可能在对外关系、外交政策、政坛格局、公共生活等领域,对小国调停者本身产生难以预料的复杂影响。

五、结语

由于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立国合法性、社会稳定等国家利益受到冲突的现实或潜在影响,以色列选择接受乌克兰的调停请求,以小国调停者的身份介入俄乌冲突。介入冲突后,以色列采用了信息传递、推动沟通等调停举措,并且围绕本国利益诉求,依托调停国身份,分别面向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了一系列看似恪守中立、实则态度分明的务实外交举措。其中,调停举措对增进冲突双方沟通起到积极作用,其他外交举措则使得以色列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其旨在确保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确认了以色列空军仍然拥有叙利亚空域的自由行动权。总体看来,尽管介入俄乌冲突使得以色列相对有效地缓解了其国家利益所面临的现实冲击和风险,但介入冲突及其相关举措,使以俄、以乌、以美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同时再次折射出以色列政局与社会的碎片化态势。在俄乌冲突尚未平息、大国竞争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以色列介入冲突的得失与成败,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评

^① “Horowitz Slams Shaked for Refusing Medical Insurance for Ukraine Refugees,”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18,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horowitz-slams-shaked-for-refusing-medical-insurance-for-ukraine-refugees/>,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9日。

判。

从以色列介入调停俄乌冲突这一案例来看,本文的两个假设基本得到了支持。亦即,当国际冲突攸关自身的关键利益时,即使调停资源与影响力相对不足、调停策略选择有限,第三方国家仍有可能选择成为小国调停者,介入到冲突之中。但此时,小国调停者介入冲突主要追求实现本国利益,促进冲突消弭只是其具体的政策目标之一。因此,除了运用其有限的调停举措外,小国调停者还将根据具体目标和现实考量,面向冲突方采取更为务实的外交举措。这些务实举措围绕特定政策目标,旨在实现小国调停者的国家利益,而并非一定有助于国际冲突的实质缓和,且可能对小国调停者本身产生复杂的政治影响。

需要指出,对国家而言,介入国际冲突是从属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具体外交实践,富含多维度的政策考量。因此,即便本国利益深受国际冲突影响,国家如何介入冲突,是提供调停抑或选边站队等具体介入举措的抉择仍然需要结合实际具体分析和研判。例如,在此轮俄乌冲突中,国家利益同样深受冲击或威胁的白俄罗斯、波兰、立陶宛、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等周边小国,却选择了站队、追随乃至军事援助等途径,更为高调直接、态度鲜明地介入冲突。这一现象折射出本文假设的逻辑链条与解释力度还有待继续精进,而更丰富的案例实证,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促使小国介入冲突提供调停的其他关键因素。

应该看到,以色列调停俄乌冲突的经历及效果还有更深层的战略和政策启示。国家安全诉求与国家安全能力之间或是基于事实或是源自主观的差距,使得以色列尤其依赖于大国盟友提供关键的国家安全保障。而立国与建国的现实经验,又推动以色列的战略逻辑和政策思路就此形成路径依赖。这一逻辑及其政策的顺利实践,有赖于提供关键保障的大国数量及其相互关系。自肯尼迪政府首次提出美以“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概念以来,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为仰仗的大国盟友。但近年来,伴随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且一定程度地从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以色列不得不面临棘手的现实问题:面对美国和其他域外大国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及地区影响力消长,如何把握同相关国家关系的微妙平衡?此轮俄乌冲突带给以色列的外交考验,正是该问题的具体表现之一。随着大国竞争态势加剧,中东格局复杂演化,可以预见,相似的考验与挑战还有待以色列应对。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